

■周末随笔 | Weekend Essay |

畅想儿童节

汤亚平

即将到来的六一节怎么过？除了带孩子出去玩游戏机、游乐场，吃比萨和肯德基，六一节还可以怎么过？这的确是在深圳许多年轻父母感到头痛的事情。

现代儿童的父母自然不知道，国际儿童节的设置，和发生在二战期间一次著名的屠杀有关。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为了保障世界各国的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决定以利迪策村屠杀时的6月的第一天为国际儿童节，又称六一节。

笔者提及国际儿童节的设置，自然不想给孩子留下战争残酷的阴影。中国六一儿童节与十一国庆节同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儿童节早已是一个儿童越来越幸福的节日了。但是，一味地“被幸福”对孩子的成长有利吗？

我们的六一节最好的礼物是书包，我们的儿女们六一节最好的礼物是学习机，而儿女们的孩子们六一节最好的礼物则是IPAD、IPHONE，凭着它可以走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偷菜”也足不出户，手不沾泥。他们的童年在虚拟的世界里度过，离大自然越来越远。

现代孩子在变，儿童消费已经形成一个数以千亿计的产业，可孩子能选择的游玩方式越来越少了，然而他们主动创造的娱乐方式却越来越多，就像迪斯尼里的卡通人物最后都会在迪斯尼乐园有一个真人来扮演一样，要让孩子们相信游戏是真的，那就要在现实世界里玩游戏，才能哄得他们转。眼下的问题是：迪斯尼之后，婴童产业何去何从？

近期深圳华侨城集团开发了旗下的儿童职业体验连锁乐园品牌麦鲁小城，其中职业体验馆排列着鳞次栉比的卡通风格小房子，警察局、消防局、医院、烘焙屋、比萨店、报社、电视台、模特公司……应有尽有。深圳莲塘梧桐山风景区仙桐体育公园有攀岩区和攀岩馆，小孩子把攀岩当游戏。在这里，他们比大人学得更快，因为孩子还存在天生的攀爬本能。据说，孩子还有潜水、音乐等许多天赋。一不小心，就被大人们抹杀了。

产业导向一定程度上决定孩子的未来，深圳婴童产业应该有更多的创新产品。笔者还认为，中国婴童产业应该扎根于本土文化。譬如造一个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天宫”，建一个模拟八仙过海的“海上冒险乐园”，让孩子们各显神通，相信会比迪士尼更吸引孩子。深圳的孩子应该有更多的游玩选择，让他们有更多与众不同的节日记忆。

■微话题 | MicroBlog |

主持人：近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121.69万元，其中城市家庭247.60万元。但反观中位数（数列正中间位置的数字），城市家庭资产的中位数仅为40.5万元。由此可见家庭收入差距之大。你被平均了么？

金麦子：在90%家庭总资产仅占全部家庭总资产的15.4%”这样的现实下，247万这个光鲜亮丽的数字，却难以变成民众实实在在的福利。华丽外衣无法掩盖严酷的事实，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生活不公正，人们需要有“能够促使这个社会不断改善的危机感”才对。

风2011：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国城市户均资产247万元。参与调查人员坚称，数据是可靠、可信的。让俺对城里充满无限遐想！打住！即想起一笑话：当比尔·盖茨走进一家咖啡馆，平均起来咖啡馆里的所有人都是千万富翁了。当头一棒！

Tina：《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中国9成家庭拥有住房，员工平均月薪4134元，城市家庭资产平均247万。尼玛，看了这个报道，顿时觉得悲催。汗颜啊，又给社会主义拖后腿了。被平均，被资产，多年保持拖后腿，落后分子的位置从未被超越。

崔鹏飞：人均工资被“拔高”、“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的数据又让很多无房百姓“被住房”，而今天“城市家庭资产平均247万”的华丽数字又粉墨登场。一次次的“被平均”、“被幸福”，后腿拖了一腿又一腿之后，民众切身感受与无处考证的官方数据之间的巨大落差，让不少人习惯了质疑。

温馨阳光：年轻人的钱，除了上网与超市购物，与朋友玩耍、旅游、交异性朋友、日常开销，能作用的地方太多了。诸如成家 and 立业、买房买车、孩子抚育与教育、卫生与保健、帮家人买健康、家庭财产保险、孝敬父母等等，既要赚钱，也应省钱。那么就“能赚的要赚，当用的要用，可省的还是要省”。孩子们该有正确的认识！

cxg007：据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中国城市家庭平均资产高达247万元，很多人提出质疑，我想应该没有错，它只是说平均247万元。现在错就错在国家两极分化严重，财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有些靠政策，靠关系暴富起来的人，富可敌国。而真正靠诚实辛勤劳动的人们，却很难拥有可观的财产。

(陈英 整理)

更多精彩证券微博尽在 <http://t.stcn.com>

荒腔走板的价格听证制度

肖国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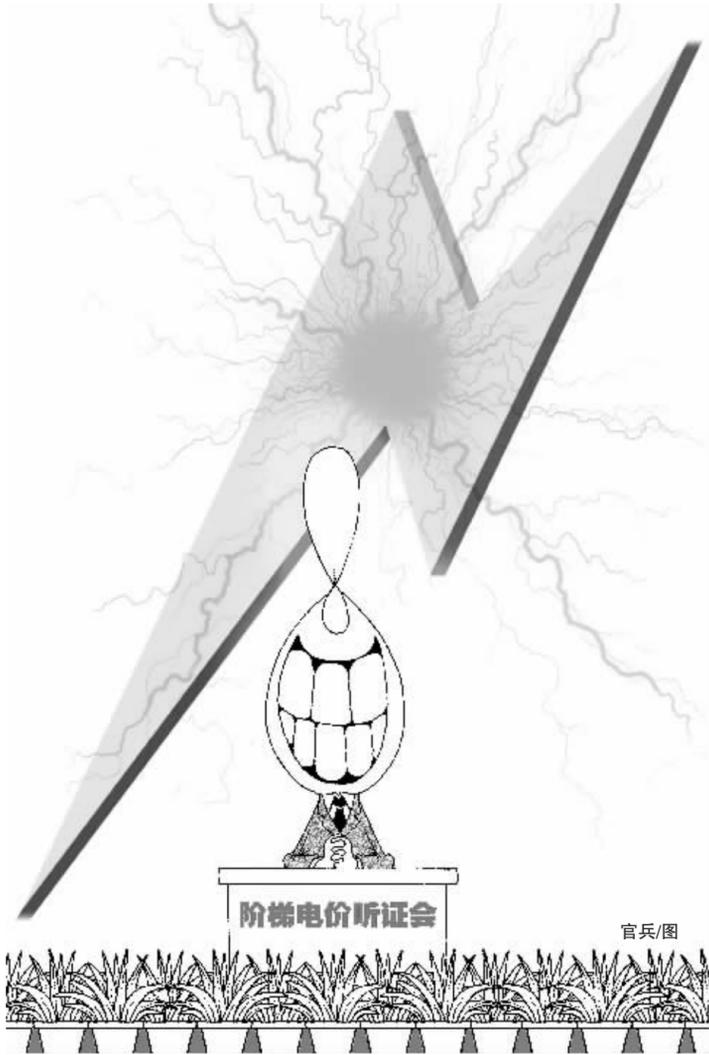
5月16日，广东省物价局举行了阶梯电价听证会，结果是纷争并没有消除，引来舆论哗然。近几年来，许多有关水电气、公交、的士价格之类的听证会轮番登场，民众得不到听证的好处，反倒领略到了听证会的要义所在：“听证”变成了“听涨”的代名词。要知道个中缘由，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听证制度进行一番解剖。

听证最早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理念，即任何权力都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因此，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通过某些程序公正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之后，英国在1215年的《大宪章》中又阐述了关于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公正。正当法律程序的听证，原来只适用于司法审判，即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必须经过听证，这种听证制度被称为“司法听证”。后来，这种制度从英国传到美国，听证的范围有所扩大，不仅包括司法听证，还涉及行政管理等领域。

不必忌讳，对于中国而言，听证制度完全是舶来品，就像市场经济是舶来品一样。按照哈耶克的社会政治理论，我国的听证制度不是自发出现的，非属自发秩序，而是移植嫁接过来的，属于理性建构的范畴。由于受体不同，听证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因此，听证变成“听涨”则具有内在的难以颠覆的逻辑。

追溯历史，可以知道，我国的听证制度始于1993年。那一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的价格审查制度，可以认定是价格听证制度的雏形。此后，有关省市相继建立了价格听证制度。1996年3月通过的《行政处罚法》，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听证制度做了规定。1997年通过的《价格法》和2000年3月通过的《立法法》，又对价格决策和地方立法听证做了规定。法律法规关于听证制度的规定，加速了听证程序建设和听证制度的实施推广。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政府部门制定了一些专门的听证程序或规则、办法。听证在价格决策、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国家赔偿等诸多领域被广泛采用。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率先引进听证制度是出于突破原有的价格决策制度的束缚、达到创制价格形成新机制的目的。其动机与出发点都是改革旧



有的行政单向决定价格的做法，在价格决定中引进对冲与制约机制，以增大价格的合理性，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采用价格听证的意图来看，是试图在非由市场竞争决定价格的领域通过模仿市场机制构建一套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遗憾的是，20年的实践表明，价格听证并没有实现初衷——既没有在具体的价格决定方面让消费者获得满意的结果，也没有在确立长效机制上有所斩获。唯一的结果就是听证为产品涨价提供程序合法的舆论藉口与法律依据。

从机制设计角度看，听证是为了弥补决策者的非理性从而保障公平正义的最大化，而不管这种非理性之结果是因为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还是别的原因。因此，有效的听证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1、要保障听证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2、为了保障双方的平等得以落实，保障结果的公平正义，必须引进独立的第三方主持听证；3、尽可能吸收反对方的建议与意见。因此，听证本质上是一种补充机制与矫正机制，是为了防止赢者通吃，实现“尊重弱者、反对多数暴力”的社会正

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之我见

胡飞雪

美国人沃伦·巴菲特无疑是一代投资高手，其价值投资理念值得推广，也值得投资人细细琢磨。但在对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的译介、宣扬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敢苟同的倾向，即神化巴菲特，简单化、教条化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有人在电视上讲，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就是三句话：一是不看股票看公司；二是不看价格看价值；三是寻找安全边际。笔者认为，如此宣讲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是需要商榷的，因为这样很可能误导处于启蒙阶段的投资者。

笔者是赞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的，但要在我国进行股票投资，还需要结合沪深股市的国情做一些辩证的思考，断不能死搬硬套、机械教条地理解、运用。考察一下股票的历史，我们便可知，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其实体现的是股票投资兼企业投资的本色。就是说在股票刚出现的那段时期，人们就是如巴菲特今天这般从事股票投资。那时候，持有股票和经营企业是不分的。但自从有了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股票交易所即荷兰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之后，股票投资发生了异化。或者说，股票投资从企业投资中分离了出来，逐渐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在全球

范围内随着资本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投资工具、投资手法日益花样百出，股票投资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形状。在这种新情况下，如果依然不看股票看公司以及不看价格看价值，恕在下直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合时宜的。不看股票，不看价格，是在股票交易所出现之前的行为选择。而在股票交易所出现之后，不看，恐怕是不行的。

事实上，巴菲特是看股票也看价格的，虽然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一台行情报价机。只不过他不像那些职业交易者、日间交易者（即不留股票过夜的交易者）那样，时时坐在行情屏前死死盯着罢了。所以，对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准确的概括描述应该是少看股票多看公司，少看价格多看价值。对股票和公司、价格和价值，是少看和多看的区别，而不是不看和看的区别。这种区别，欲学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的投资者一定要认识到。

寻找安全边际当然也十分正确。但在实际投资中，在解决方法论之前，一定要先解决什么是“安全边际”的认识论问题。巴菲特是投资高手，是内行。他有思想方法，但也应承认，他不是完人，不是神。他也有不足之处，也有短板，也有跟不上时代不适应环境的时候。比如他始终无法理解

高科技企业，他还偏执地认为2000年前后的IT网络股行情是泡沫。其实，所谓泡沫，就是在事后看来投资过热，这是正常现象。比如美国19世纪的铁路建设，也是重复建设严重。但谁也不能由此而否认它具有伟大的经济价值，简单地斥为泡沫只能被认为是偏见无知。对高科技企业看不懂，因而认为投资高科技企业就是不安全，这种逻辑对巴菲特来说也许不算什么毛病。但如果推广开来，让广大投资者也接受，则委实不妥。巴菲特的寻找安全边际说法从投资理念的层面来看，当然很有道理，但在具体操作层面，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些不安全的地方。如果赶快补课，把它搞懂，进而把它变成可知的安全的，那就是值得投资的目标。

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当然具有普世价值，但在沪深股市，断不能对这种普世价值估计过高。因为沪深股市绝大多数投资者很难解决股票投资的首要问题，即“看公司”。广大投资者很难“看公司”。他们既无力去上市公司调研，也看不懂上市公司的半真半假、虚实相生的信息披露。中国本土“股神”林园就说，只有25家中国上市公司他能看懂。“股神”尚看不懂，遑论其他芸芸股民。巴菲特有句名言：当我们投资购买股票的时候，应该把自己

义目的。

以此为参照，我们发现，我国价格听证最大的问题是组织者缺乏独立性：不仅不是独立的第三方，而且往往是所涉部门的行政领导者。近几年来，我们对水电气等公共产品的价格听证一律由各地的物价管理部门主持。这类产品本来都由国企经营，而且基本上是独家垄断。作为价格行政主管机构，物价部门与这些国有企业的关系形同手足，情同父子，不可能保障听证的公正，其结果是屡次听证会都认可企业提出的理由以涨价而告终。而这样的价格却远远高出市场的竞争性价格。最明显的例子是，山东魏桥集团自办电厂的电价比国有电厂便宜1/3。可以说，在现行的听证制度下，保障听证结果的公平正义几乎是一厢情愿，以致听证制度很容易沦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操纵价格、压制民众利益诉求的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价格听证制度上缺少一个成本监审程序。在这种观点看来，似乎只要增加成本监审程序就可以解决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对于成本审查，我们要明确两点：一是成本审查机构本身的独立性问题。在目前条件下，这几乎与价格听证本身的独立性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二是成本本身具有巨大的弹性。魏桥电厂的电价之所以比国有电厂低，根源就是成本低。而成本包罗万象，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其构成有云泥之别。经济学告诉我们两个简单的道理：其一、产品成本不是事先人为设定的，不是常量，而是竞争的产物，是可变量。其二、不是成本决定价格，而是价格决定成本。而我国的价格听证就是建立在成本决定价格的错误前提下，想当然地将既有成本看成是合理的、消费者必须接受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加上成本审查程序，也不能改变现有的听证制度所固有的缺陷。

听证制度在我国的遭遇只是许多类似制度的一个缩影，其貌合神离的扭曲与变奏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入。简而言之，这样的机制与制度在架构与形态上与市场经济要求的非常相似，乃至一模一样。但是，其实施基础与环境却有天壤之别。因此，被引进的制度与机制的内在机能难以形成，发挥不了应有的制约作用，反而扭曲了利益关系，成为固化不公正关系的加速器。因此，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教训时，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就是反省这些貌合神离的制度，从制度环境、制度基础入手，重新构建合理有效的机制以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创造和谐高效的新局面。

当作是企业分析家，而不是市场分析家、证券分析家或宏观经济分析家。”这话在美国也未必全对，移植到中国，更未必有理，甚至不比“长线看公司、中线看政策、短线看技术”的中国本土智慧更有道理。

上市公司正搞重组，它的股票在二级市场上已开始活跃，有人称这叫投机炒作。其实巴菲特也干过这类活（即买入股价被严重低估的股票，有时候还进入公司管理层或委托别人经营），但何以人们不认为巴菲特投机炒作重组呢？因为成见和偏见。其实炒重组并不违价值投资的逻辑，白青山先生所著《民间股神》（第三集）介绍的“顺手黑马”彭乃顺就曾颇有见地地指出，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在中国是压缩版，在时间上高度压缩，从而显得投机性比较强，可以说是在投资理念下的投机；在成熟度上还是雏形，似乎显得还很稚嫩，没有广泛市场。这话说得相当精彩，值得深思之。

巴菲特之所以崇尚价值投资理念，与他的性格有关。我们在学习他的投资理念时，不能不考虑他的这一主观因素。价值投资的内核只有一种：大道至简。但其外在表现形式却可以多种多样。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观，而不是方法论。对它，应该抽象地学习，借鉴，活学活用，而不能把它格言化、教条化，不能简单地复制套用。